

南开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盛斌：

# 全球化“穩定器”：逆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角色

本報首席記者 單穎文

近年來，世界範圍內的“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現象逐漸升溫。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趨勢？逆全球化會對全球化進程造成怎樣的衝擊？中國應當如何適應和應對？在近日舉办的以“亞洲與世界：新動力、新格局、新秩序”為主題的“上海論壇”上，本報記者就上述問題詢問了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盛斌的看法。

盛斌在接受採訪時指出：中國可以成為全球化的“穩定器”，當然，這需要中國做一些角色轉換；中國過去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為全球經濟治理改革與創新確立了新的坐標，中國近年來在發展新經濟方面的經驗，比如自主創新、互聯網、電商、綠色金融等，也為全球治理創新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經驗，我們應該對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充滿信心。



## 不同以往的逆全球化：发达经济体深陷其中

**文汇报：**您在“上海论坛”上的发言，话题集中在逆全球化的应对与出路上。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全球化、“地球村”，到了这两年，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逆全球化”这个词逐渐成为了高频词汇。请您谈谈对这种变化的基本认识。

**盛斌：**我认为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而来，至少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短期趋势。

其实逆全球化历来就有。上一次“反全球化”的高峰期是在1999至2001年世纪之交，主要表现在劳工、环保、学生、人权、宗教组织及左翼社会团体等，借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例会时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引发暴力冲突。这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大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富人们推动的市场与价值扩张，侵犯了弱小国家的主权、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当地文化和传统，同时也对少数缺乏竞争性的脆弱社会群体形成严重冲击与伤害。

**文汇报：**“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词。那么，当下的“逆全球化”有哪些显著特征？

**盛斌：**确实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说逆全球化，多是出现在一些小国、弱国、穷国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或者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会与非政府组织NGO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比如劳工、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反对全球

化进程。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进一步恶化，我想，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最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这次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正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崛起，其人数与影响力比先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性变化。比如，美英等被我们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在鼓励货物、资本、服务、人员以及技术自由流动方面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是最支持竞争、开放与经济一体化的发达经济体，也是长期以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最重要的旗手，而且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现在恰恰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分裂，美国特朗普上台、英

国脱欧、欧洲大陆右翼政党的崛起，都是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全球化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文汇报：**有学者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逆全球化问题的出现影响甚大，也有学者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贸易问题联系起来。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盛斌：**很多研究显示，收入分配恶化是影响逆全球化情绪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自动化、数字鸿沟、过度金融化等都会导致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加剧。其他影响逆全球化的原因，还包括大量的难民（包括移民潮）、宏观经济失衡、全球复苏乏力以及反建制派的政治和社会活动。

但是，目前很多人还是把问题归结到以贸易和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上，那么，我

们不妨思考一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什么？贸易应该是被批判的对象吗？其实，大多数的文献和研究都有相同或类似的结论，即贸易是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至少不能与技术创新以及失败的社会政策相提并论。所以说，贸易投资、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是反全球化的替罪羊。尽管这个结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已经存在多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难被目前的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也会被政治家“选择性”忽视。

**文汇报：**在您看来，逆全球化的趋势是否已经带来负面影响了？

**盛斌：**可以说已经有些端倪了，比较明显的是，逆全球化思潮对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严重的威胁。

(下转13版) ➔

◀ (上接11版)

是法律，因为偶然机会选修了经济学课程，才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随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但是他一生并没有任何经济学的正式学位，除了后来的一些荣誉学位。哈耶克192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的学位也是法学学位，大学期间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最终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当然，哈耶克著述所涉及的学科远不止这些，还包括

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毫无疑问，求学过程中的多学科学术训练，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观察视野，为他们后来在经济学上的学术创新创造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实，经济学家中这样的经历过学科转向或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在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丁伯根、麦克法登是学物理出身的，希克斯、德布鲁、纳什、阿罗、莫里斯、赫克曼等都是学数学出身的，萨缪尔森是学文学出身的，卢卡斯是学历史出

身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托马斯·萨金特是学工程学出身的，他们都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是跨学科训练的受益者，并且很多是理科出身，如钱颖一、陈志武、白重恩、笔者本人等许多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原来都是学数学的，黄明、王江、洪永淼等是学物理出身的。之所以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

学在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引入研究的学科交叉方法创新上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其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其工具也适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和社会学。

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也要非常强调跨学科的训练，强调理论、历史和统计对于经济科学素养形成的重要性。由于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既需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往往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及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三者缺一不可。现代经济学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同时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体进行学理性分析，既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有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同时还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加以检验和考察。的确，在最终的分析中，所有知识皆为历史，所有科学皆为逻辑，所有判断皆为统计。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